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迷惑”的“麻烦”？

城市中国的逻辑

他人的心事

行脚印度

一群人就成了一头畜生

大货司机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汪伟 扬克 孙骁骥 灵子

轮值编辑

灵子

观察员

文学: 朱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 成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羽良(北京)
刘柠(北京)	严飞(美国·旧金山)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克(德国·图宾根)
灵子(北京)	燕舞(北京)
吴强(北京)	言一(成都)

翻译

吴万伟(武汉)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

2012年11月 第6卷第9期

总第60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 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 观点尊重个人趣味, 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 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 对于相关部分, 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 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 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 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 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 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 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 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 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 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苏珊·桑塔格曾说，如果不得不面对真理与正义的选择，身为作家的她，还是会选择真理。她这样说，是为了避免政治把文学拖下水，避免暂时的毁掉永恒的。不过，大部分时候我们面对的选择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更多时候，正义与真理携手站在一侧，考验应对者的勇气。

岁末围绕莫言诺奖的争论不断，与年初韩寒“抄袭”争论恰好呼应，从头到尾，“文坛”的纷扰持续了一整年；更不必提那些政治大戏了。然而热闹之后，什么都没留下，什么也都没改变，甚至争论者的观点，在辩论之后也依然固我。惟有时间流过，碌碌又是一年。与其消耗于各种围观、猜测、争论乃至虚妄的期待或悲观之中，不如低头读书、写作，安心做点实际的事情，如此即便末日预言成真，也不枉过

○

勘误：

上期“阅读报告-文史”一文中，“在中国，一本诗集销量‘不错’的标准，大概是6400册，如果能达到6.4万册，”后面少了一句话：“那除非是汪国真或《红旗歌谣》。”特此勘误。



目录

封面用图

Marc Riboud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文 史 • 王晓渔
思 想 • 成 庆

005-008

阅读报告
台港海外

文 学 • 罗四鸰

009-011

书评

• 刘 柠
“迷惑”的“麻烦”？

• 夏佑至
城市中国的逻辑

• 戴新伟
他人的心事

012-030

游历

• 维地亚
行脚印度

031-036

随笔

• 罗四鸰
一群人就成了一头畜生

037-038

读图

• 刘飞越
大货司机

039-045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每次撰写阅读报告之前，都会列出准备推荐的书目。但是好书太多，每次总有些留待下回分解。到了年底，积压的书目已有长长一列。这次一次性地介绍，限于时间，只能点到为止，还请诸位看官见谅。

首先介绍一些隔年的漏网之鱼。

现代中国，第一次共和是如何被第一次党国取代的，这是我这几年持续关注的问题。叶曙明先生的《中国1927·谁主沉浮》（花城出版社，2010年11月），部分地回应了这个问题。这本书梳理了国民党“党化”的过程，这种“党化”指的是一个和平竞争式的政党如何转型为暴力排他式的政党。其中陈廉伯的广东商团和孙中山的大元帅府的冲突，尤为值得关注。可以说，梳理国民党的历史，必须从重新评价“二陈”（陈炯明和陈廉伯）做起。2002年，中山大学即有以《广东商团与商团事件》为题的博士论文，不知为何，迄今未见出版。

多年以前，在《上海文化》（2005年第2期）上读到《汽车与中国现代文学及电影中的空间生产》，从“汽车”入手解读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的小说以及蔡楚生的电影《新女性》，虽然只是点到为止，却别有洞天。徐敏先生的《现代性事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可以视为文化细



读的典范之作。徐敏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和深入的符号解读能力，这两个评论家必备的品质，在学术规范年代反而成了“原罪”。尤其在学报体已经成为学术领域的“新华体”的今天，讲究文体意识常常遭致“不学术”的指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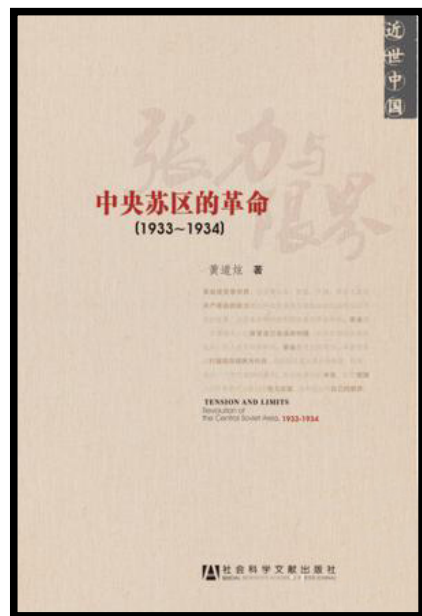
应奇先生主编的《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因为是一本学术普及读物，一直没有关注。偶然翻到，发现编者相当用心，导读者都是一时之选，从周保松、何怀宏到周濂、徐贲。入选的政治哲学名著更是无法回避，罗尔斯、诺齐克、柯亨、德沃金、内格尔、斯坎伦、麦金太尔、桑德尔、沃尔泽、欧金、泰

勒、拉兹、哈贝马斯、西蒙斯、马格利特、森、德里达，几乎是一部简明的当代政治哲学史。

黄道炫先生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刚刚出版的时候没有太大反响，但是慢慢地在专业领域开始热起来。好的学术书往往是这样，很难一鸣惊人，需要一定的时间被慢慢认知。中央苏区的革命，这种题目不太好写，要么过于主旋律，把历史写成了小说或者神话，要么又无法在内地出版。《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是内地同类题材中为数不多值得一看的著作，作者很少发表议论，通过史料的陈列告诉读者：革命如何具有了超凡魅力，这种超凡魅力又是何等的危险。

农村包围城市，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路线图。但是，农村包围城市之后，农村并没有成为允诺中的“乌托邦”(当然，城市也没有)。张英洪先生的《农民公民权研究》(九州出版社，2012年9月)，讲述了农民是如何失去公民权利的。他认为把农民问题归结为土地问题、文化问题、收入问题和人地问题，是不够的，这种提醒非常必要。正如把中国问题归结为素质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这些解释恰恰回避了最为关键的制度问题。

在张英洪看来，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农民权利问题，是土地产权和平等权利。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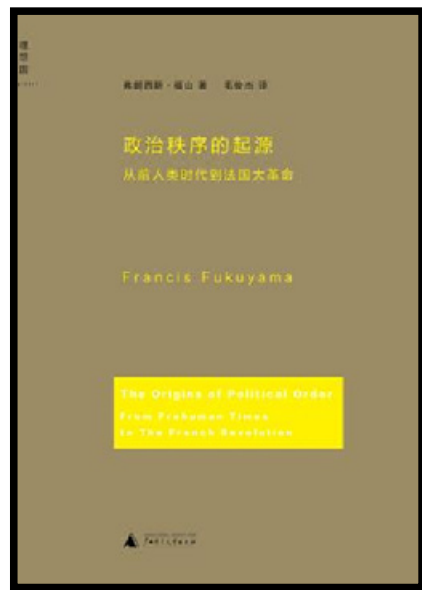


“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恰恰是对土地产权的严重破坏。分得的田地很快又被没收，几乎是从最初就预示着的。至于农民的平等权利，只能用《动物农场》里的那句话来解释：“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因此，公民权利对农民而言是重中之重。但是在中国，这又不仅是农民问题。很难想到有哪个阶层不是二等公民，哪怕是既得利益和特权阶层，他们除了以移民的方式在其他国家享有公民权利，在自己的国家同样无法享有宪法中的那些权利，无法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一旦失势，同样无法享有公正的司法。

非常抱歉，积压书目只写到一小半，因为时间的原因，就只能打住。看来还是要留待下回分解。Q

观察员 成庆（上海, veron.cq@gmail.com）

与前十年乃至更久之前的公共思想界相比,今天政治思想的译介已经基本进入专业化、体制化的阶段,学术思想的引介与公共知识界的互动仍然存在,但显然已不及当年那般急迫与热烈。以罗尔斯为例,虽然由他引发的各种议题在欧美政治哲学界长期都是显学,但在中国学术界,他并不比哈耶克、伯林这些自由主义者更具影响力,对他的研究也未见深入推进。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内的政治哲学界,罗尔斯仍然是绕不开的。也许是罗尔斯最后一部著作的《简论罪与信的涵义》(左稀、仇彦斌、彭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8月)(收录了罗尔斯的本科毕业论文和一篇较少为人所知的重要文章《我的宗教观》),2009年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近期即有了中译本;而集其单篇论文之大全的《罗尔斯论文全集》与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万民法》也将推出中译本和新的中译本(陈肖生译,吉林出版集团,2012年12月)。此外,近期还有一本关于罗尔斯的二手研究值得关注,即佩西·莱宁的《罗尔斯政治哲学导论》(孟伟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此书作者不仅是荷兰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而且与罗尔斯私交甚笃、过从密切,因此这样一本导论性的著作,应有品质上的保证。可以预计,随着罗尔斯著作的



译介基本完毕,关于罗尔斯的专业研究未来也将会逐渐增多。

说到自由主义者,“伯林热”虽然这几年已经逐渐降温,但其著作的译介却一直在进行。最新出版的是其三卷本书信集的第1卷《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陈小慰、叶长缨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9月)。值得一提的是,伯林并不如罗尔斯那样只是纯粹的学院派,他早年曾在纽约、华盛顿及莫斯科担任过外交官,这就使得他的书信不仅包含大量学术界的记录,而且还能反映二战期间西方的政治外交状况,加之伯林本人“巧舌如簧”、多才多艺,因此其书信集更能展现他的某些独特风采。

在今天的学院体制下，有能力且有胆识去写作通论式思想史著作的作者，显然并不多见，但福山显然想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其皇皇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一卷，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如今已译为中文出版，从表面来看，福山虽然带有“保守主义”意味，但是他所依赖的理论假设却回到了科学主义，而与霍布斯、卢梭等思想家的契约论传统分道扬镳。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而从这里出发，又如何看待他与早年过从密切的斯特劳斯学派之间的关系，本身也是一个有趣的当代思想史议题。

中国未来政治路径如何设计，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民国时期的儒家立宪派、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各自都有一套建国之路的蓝图，从某个角度来说，如今重新泛起的政治路径之争，其实也只是这一路线图争论的重复而已。例如任剑涛的《建国之感：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

误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以民国留学运动为入口，考察各个国家（法、德、美、英、俄、日）对于中国留学精英的政治观念产生何等影响，以至于他们在民初又是如何构造各自的政治路线。又以儒家为例，1990年代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被视为是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理想结合，引发了大量讨论，狄百瑞的《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尹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在当时就是这样一本试图论述儒家特殊经验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著作，如果说当时还主要是以台湾地区、新加坡、日本乃至韩国的经验为主，那么狄百瑞其实看到了自由主义与传统儒家社群观念的某种亲和性，这种亲和性在狄百瑞那里无疑是正面的遗产，但在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氛围里，这种社群主义的资源要么只是历史的记忆，要么其实是与集权合谋的关系，并不值得重视。如今看来，这一争论到今日还尚未停歇。❶

特约观察员 罗四翎 (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到了年底，文学奖也开始纷纷出台了，最让人瞩目的文学奖当然莫过于诺贝尔文学奖。我对于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是：这么一个政治性大奖，颁给体制内作家终究会是一个大丑闻。就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刚好获奖作家莫言去领奖，不一会儿各大网站头条新闻是《Mo Yan, Nobel Literature Prize Winner, Says Censorship Is Necessary》。莫言也罢。

法国当地时间11月7日，龚古尔文学奖，在经过最后一轮角逐后，高中哲学老师杰罗姆·法拉利(Jérôme Ferrari)凭借小说《罗马衰落的教训》(The Sermon on the Fall of Rome)而摘冠。龚古尔文学奖被认为是法语文学最高奖项之一，其获得者除能让作品大卖之外，也得获得世界声誉。杰罗姆·法拉利1968年出生于巴黎，在巴黎一所大学获得其哲学学位。作者看到西方的衰落，想起了古老帝国的衰落，如古罗马的衰落。小说讲述了一个年轻人放弃哲学，和朋友开了一个酒吧，希望将其打造成和平与友谊的天堂，但酒精、性、堕落使一切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给他们的理想蒙上阴影。小说的题目取自于圣·奥古斯汀的一篇著名的布道，在这篇布道中，他说：“世界就像一个人：出生、长大，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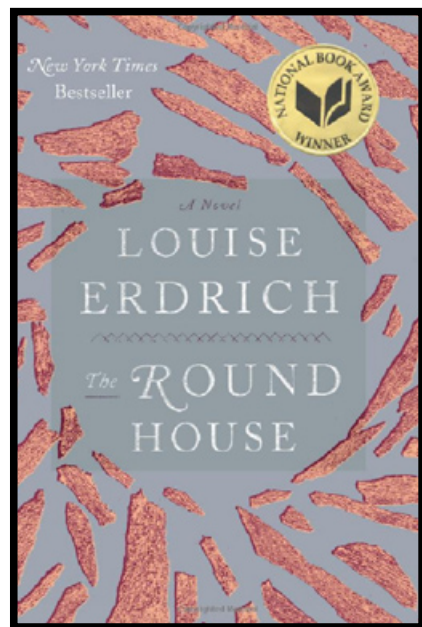


最后进入角逐的另外三部小说分别为瑞士法语作家乔·狄克Joel Dicker《哈利·奎贝特的真相》(The Truth of the Harry Quebert Case)，法国作家帕特里克·德维勒(Patrick Deville)的《鼠疫与霍乱》(Plague and Cholera)，和琳达·李(Linda Le)的《海啸》(Groundswell)。其中《哈利·奎贝特的真相》获得10月25日公布的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小说讲述了一个灵感枯竭的畅销作家帮助自己的朋友兼导师查明真相的过程。帕特里克·德维勒的《鼠疫与霍乱》获得11月5日公布的费米娜文学奖，小说根据

瑞士裔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亚历山大非凡的一生撰写而成。而龚古尔文学奖给了杰罗姆·法拉利，却让人有些意外。

同样让人意外的是与龚古尔文学奖同日公布的勒诺多文学奖，卢旺达女作家斯科拉斯蒂克·姆卡松加（Scholastique Mukasonga）凭借小说《尼罗河圣母院》（Our Lady of the Nile）获得今年的勒诺多文学奖，尽管这部小说并未在最后的评选名单中。斯科拉斯蒂克·姆卡松加1956年出生于卢旺达一个图西族家庭，1976年移居布隆迪，1992年移居法国。为此，她逃脱了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屠杀，但她的母亲以及其他26位家庭成员却被杀害。2008年她曾出版小说《裸足的妇人》（The woman with bare feet）纪念她的母亲。2012年出版的《尼罗河圣母院》讲述的是大屠杀发生之时，尼罗河旁一所女子寄宿中学里发生的故事。当残酷的杀戮逼近这所平静的学校时，阴谋取代了友谊，敌意、迫害和种族暴力的煽动开始弥漫在学校。经过评审员10轮投票，它最终获得勒诺多文学奖。斯科拉斯蒂克·姆卡松加得知消息时，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当时她正在卡昂，为此，她不得不立即跳上火车去巴黎领奖。勒诺多文学奖创立于1925年，以法国报业之父勒诺多的名字命名，不设奖金。

11月14日晚，在美国，另一位女作家路易斯·尔德里奇（Louise Erdrich）的



小说《圆形屋子》（The Round House），也因其对种族暴力的出色叙述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讲述了一位少年努力调查在北达科他州保留地发生的一起袭击他母亲的事件，以及他与他们文化中的暴力进行妥协的努力和抗争。在领取奖项时，尔德里奇用了一部分印第安土著语。她说，她非常感谢“土著妇女的慈悲与忍耐”，“这本书是一个巨大的案例，它反应了在保留地里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不公正。谢谢你们让它有了更多的读者。”尔德里奇已出版14本小说，其中包括1984年出版的《爱之药》（Love Medicine）。

与最近几年许多不知名的作家被提名不同的是，今年的国家图书奖的评选被认为非常激烈，最后进入角逐的多是拿过

大奖的，如普利策奖获得者朱诺特·迪亚斯 (Junot Díaz) 和大卫·艾格斯 (Dave Eggers)，两人的新书《你就这样失去她》(This Is How You Lose Her) 和《一张国王的全息图》(“A Hologram for the King”) 均获提名。

另一个颇为热闹的奖项莫过于“美国最好图书奖”。11月16日，美国主流和独立出版社的第一网络杂志和评论网站——“美国图书新闻”(USABookNews) 公布了2012年美国最好图书获奖名单，有超过400本的100多个类别的纸质书、电子书和有声书获得该荣誉，以表彰在2011年和

2012年新出版的一些优秀图书。“美国图书新闻”CEO和主席杰弗里·肯 (Jeffrey Keen) 说，今年从各个主流和独立出版社选出了超过1500本书，最后再将获奖图书缩减至400多。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最新好小说”由菲尔·布洛迪 (Phil Brody) 的《好莱坞的霍顿年代》(The Holden Age of Hollywood) 赢取；“儿童小说奖”由伊芙·邦汀 Eve Bunting 的《海狼的航行》The Voyage of the Sea Wolf 获取。“美国最好图书奖”今年是第十届，其评选结果基本上可以反映出美国图书出版情况。Q

“迷惑”的“麻烦”？ ——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公案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去年，日本出版了一部书：《日中国交正常化》（以下简称《日中国交》）。作者、中央大学教授服部龙二，是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因该书付梓于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前夕，是一部对中日两国复交前后历史的回顾、检讨之作，故备受学术界的关注。甫一刊行，便上了各大报纸的书评版，却也引发了“赞否两论”。

正面评价不在话下：分别荣膺《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亚洲太平洋奖的特别奖和《朝日新闻》社主办的大佛次郎论坛奖。尤其是后者，评委中不乏诸如前东大校长、京大教授和《朝日新闻》论说委员等学界“大物”，自创设以来，一向为士林所重。而负面评价，也相当刺目：老一辈汉学家、重量级学者矢吹晋教授撰写长篇书评《探寻日中相互不信任的原点——大佛次郎论坛奖·服部龙二著〈日中国交正常化〉的读法》^{注01}，指其是一部“愚蠢、

拙劣之作”；该书副标题虽为“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官僚们的挑战”，实质上却始终停留于官僚们“自我陶醉”、“自吹自擂”的层面，“听不到田中和大平的肉声，庶几等于抹杀”；“该书的书带上赫然写着‘什么是真正的政治主导’，却令我误读成‘什么是真正的官僚主导’”，难掩“对此书深深的失望”。

在“温良恭俭让”的空气颇为浓厚的日本学界，桃李满天下的前辈学者竟以如此“酷评”指摘一位后学的研究，实不多见。如果不是从后者的研究成果中发现了相当的学术瑕疵，或感到某种学术立场上的冲突，矢吹教授绝不至于光火至此。由于该问题也涉及中方，牵涉到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而对那段公案的解读，则关系到作为两国关系基础的历史问题之“解决”与否。兹事体大，敢不关注！

^{注01} 矢吹進『チャイメリカー—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192頁。

田中“问题”道歉

1972年9月25日，北京时间11:30，以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为首，包括外相大平正芳、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及政府和执政党内高官共52人的庞大代表团乘坐的日航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这是战后日本飞机首次进入北京。鉴于日本国内严峻而微妙的政治“磁力场”及邦交正常化谈判本身的艰难，田中对身边人说，“（来北京）做好了死的准备”。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欢迎晚宴。中日双方出席者逾600人，大大超过了尼克松访华时的规模。中方的准备工作，极尽周到之能事。军乐团现场演奏日本国歌《君之代》和《佐渡小调》、《金比罗船船》和《鹿儿岛小原节》（分别为田中、大平和二阶堂各自家乡的民谣）等日本歌曲；周恩来总理亲自执箸为田中布菜，斟茅台酒：“这酒，喝多少杯都不会上头。”

周总理在欢迎田中一行的祝酒词中，首先回顾了中日两国两千年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接着，话头一转：

……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

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

首相阁下，你访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在全场起立、干杯之后，田中走上主席台，致答谢辞：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

为了便于译员口译，田中的致辞按意群断开，每段间隔之后，都响起预期的热烈掌声。可“麻烦”一句既出口，台下却安静得出奇，空气仿佛凝固了。在国会讲坛上以雄辩著称的田中，额头上开始渗出汗珠，后半段的内容像照本宣科，显得有些僵硬。

田中致辞时，中方译员，生于台湾、在神户长大的林丽韞就坐在周总理的旁边。当她听到从麦克风传来“添麻烦”云云的日方翻译的瞬间，直觉“译法不太好”。同在一旁忙着为各国大使传译的英文翻译唐闻生嘀咕了一句“太轻了”，林默默地点了点头。^{注02}

当时，与田中同时立于主席台一隅、

^{注02} 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40頁。



担当口译的，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小原郁夫。小原在中国出生、长大，回国后，又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科，中文地道得像母语。据他回忆，讲话稿是事先翻译好的，逐字逐句校对过，包括在哪里停顿等细节问题，均在讲话前与田中本人沟通过。“讲话者没说的话，（作为翻译）不可能说。也不是没有脱稿当场发挥的讲演者，甚至不乏频密发挥者。但田中总理的情况，完全跟文章一样。”因此，现场口译“误译”的可能性，可基本排除。

当晚，宴会结束后，中方即刻召开内部会议，紧急讨论田中道歉问题。据说，认为道歉规格不够、提出严厉质疑的，是彼时刚刚复出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战前，郭曾长年在日本留学、流亡，被认为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知日派”。⁰³

田中自然没想到问题有多么严重。翌日早餐，是和中混搭的菜单，除了海苔、和风渍菜和梅干（均为田中的嗜好物）外，自然少不了田中的最爱——味噌汤。味噌原料，则特选田中长年食用、非此不可的新潟县柏崎市百年老店“西牧”的三年陈酱。刚从旅途疲劳和前晚茅台酒的宿醉中缓过劲来的田中，神清气爽，食欲大振。餐桌上，见大平和二阶堂相互以汉俳唱和应酬，说了句“俺不学无术”，便回到自己的房间，以颇为自信的书道，挥毫写就一首汉诗：

国交途绝几星霜，
修好再开秋将到。
邻人眼温吾人迎，
北京空晴秋气深。

——越山 田中角荣

⁰³ 矢吹進『激辛書評で知る——中国の政治・経済の虚実』（日経BP社、2007年）96頁。

这首诗当天便以手迹图版的形式刊登在《每日新闻》的晚刊上。可田中万没想到，几小时后面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足以令他食欲全消。

当天下午（9月26日），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谈。周恩来一上来就对前一天晚上田中的“问题”道歉提出了批评：在中国，某人不慎把水泼在女孩子的裙子上，说给您“添了麻烦”——这是一种轻微的道歉。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了麻烦”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至此，酿成了一桩中日关系史上旷日持久的公案，其真相扑朔迷离，至今仍间或发酵。

“迷惑”何以成“麻烦”

不用说，麻烦是出在所谓“添麻烦”的表述上：田中讲话日文原稿中的“迷惑”，被译成了“麻烦”。当然，若是照字面直译的话，如此翻译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日方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实务主导者，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后任驻华大使的桥本恕负责起草了讲话稿文本，他坚决否认“误译”说：“绝不是误译。”后来，他曾回忆说：

从战争结束，毕竟已经过了相当长

的时间。从道理上来说，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大家都明白。可是，日本大多数人，从当时直到现在，仍觉得是跟美国打仗战败了，而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虽说也得承认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日本民族的“矜持”^{注04}，也是我想努力保持的。我就是抱着这种想法起草的文本，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总理看过，完全没修改。^{注05}

作为被首相委以重任的职业外交官，桥本虽然深知“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顾及“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的国内舆论（这种舆论甚至让田中“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在道歉问题和捍卫“日本民族的矜持”之间，试图寻找某种平衡。他在1992年9月，HNK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特别节目《周恩来的决断》中，对记者谈到：“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那已经是到了极限的提法”；“我考虑了不知多少天，推敲了不知多少次，夸大一点说，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当然也给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首相看了几次，得到了他们的同意。”^{注06}

不仅如此，据小原郁夫回忆，按照外交惯例，译成中文版的田中讲话原稿事先交给中方，由中方打印之后在会场发放。同样，周总理的讲话稿也被译成日文，提前发送到出席者手中。就是说，对

^{注04} 日文的“矜持”（Kyoji），既有中文矜持之意，同时也包含自尊心、自豪、自负、自得之意，有些近似于英文的“Pride”。在此权且沿用原文表述。

^{注05} 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38頁。

^{注06} 《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刘柠著，（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8月版，53页。

于“添麻烦”的表述，中方应该在田中讲话前就有所了解。^{注07}

桥本虽然是田中讲话的第一起草人，但他当然不会闭门造车，事先理应对首相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的立场和姿态有所把握。据矢吹晋考证，田中早在出任首相之前的1972年3月21日，便曾在众议院商工委员会上，以通产相的身份做过一次答辩。他联系自身曾于1939年至1941年作为一名士兵被派驻“满洲”时的亲身经历，谈到尽管自己未曾杀、伤中国人，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毕竟在二战中丧失了众多的友人，对战争的实态还是有所了解。“我确实真心感到，给中国大陆添了太大的麻烦。因此，日中复交之时的头一句话，还应该是‘添了太大的麻烦’，对此我认为有必要从内心伏首。两国之间永远不能再战。至少我们应该表明一种强烈的姿态，那就是日本绝不再搞像过去那样的事情……”^{注08}

仅两天后（3月2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第四分科会上，田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对中国大陆，不断使用的表达是“到底添了巨大的麻烦”。不仅在公共场合如此，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亦如此。添了麻烦，是一个事实。日中要实现邦交正常化，首先要向对方表示发自内心的道歉：

添了太大的麻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作为邦交正常化大前提的、诚心诚意道歉的心情，都不会改变。……须超越恩怨，从新的视野、立场和角度出发来谋划日中邦交正常化。对那些“向后看”的东西，要划一个明确的句号，然后作为新的起点……这是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信念。^{注09}

应该说，这里的“添麻烦”，虽然听上去似乎不及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程度，但作为一种反省的表达，在日文语境中却也并不轻。



《日中国交正常化》
(日)服部龍二 著
中央公論新社
2011年

^{注07} 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41頁。

^{注08} 矢吹進『激辛書評で知る——中国の政治・経済の虚実』（日経BP社、2007年）97頁。

^{注09} 矢吹進『激辛書評で知る——中国の政治・経済の虚実』（日経BP社、2007年）98～99頁。

不仅田中，从后于1978年与中方达成《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前首相福田赳夫，到接见初访日本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昭和天皇，也都曾有过类似“添麻烦”（“迷惑”）式的表述。可见，“添麻烦”确乎是一种“准公式”的道歉表述，且规格并不很低，至少应该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那么低。

日文中的“麻烦”，写作“迷惑”（Meiwaku），而后的语源在中国。此段公案的后半段，毛泽东曾向田中赠书，暗示“迷惑”的出处与文脉——此乃后话。矢吹晋曾对“迷惑”一词在日文中语义学上的变化做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指出其在中日文语境下的不同含义。他认为，中文的“迷惑”，自《楚辞》和《魏志倭人传》时代以来，基本没有变化。现代汉语中，至今仍在与《楚辞》差不多的语境下使用这个词汇。而在日文中，截至镰仓时代前期，仍与汉语同义。从镰仓时代末期起，“迷惑”一词开始呈现出某种语义上的转化，并在现代日语中定形，成为所谓“日语之中的汉语”：即以日文特有的汉语训读来发音，与作为语源的中文古典有关联，但原有语义已被部分颠覆（转化），成了以汉语表示的日语词汇。诸如此类的词汇，在日文中屡见不鲜。除了“迷惑”外，还有“得意”、“勉强”、“合同”、“敷衍”、“地道”等等，不一而足。

就“迷惑”而言，权威的《广辞苑》（第五版）的解释，主要有三个意思：1、因不知如何做而犹豫不决；2、感到为难痛苦，苦于某件事；3、被他人置于某种困境，感到难办。而笔者手头的《三省堂古语词典》的解释，则有两层意思：1、因不知如何做而困惑，迷失张皇，惊慌失措；2、为难。^{注10}上述两种辞书的权威解释，与田中话语中的“迷惑”的语境像又不像，似是而非，但肯定不是像“添麻烦”那样简单的意思。日文古语中，还有诸如“迷惑千万”、“迷惑至极”等表现，可以说都是作为古汉语的“迷惑”，经中世以来的武士文化“发酵”、转义后，又重新作为日语沉淀的结果。矢吹晋甚至认为，那种“包含了‘万感之念’^{注11}的‘迷惑’”的用法（在今天）已经死亡”。^{注12}而日本既如此，遑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田中一句“迷惑”发言，令中方困惑不已，便可想而知了。

不过，客观地说，这种从历史文化到语义学上的学术探究，虽然是汉学家矢吹教授的强项，但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包括职业外交官桥本恕。桥本不谙中文，却被田中委以重任，作为邦交正常化谈判具体方案的策定者和田中讲话稿的“枪手”，虽然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但他反复“考虑”、“推敲”的，笃定只能是日文原文，而不是如何译

^{注10} 两种辞书的解释，均系笔者翻译。

^{注11} 原文写作“万感の思い”，意思近乎于中文的“百感交集”。

^{注12} 矢吹進『激辛書評で知る——中国の政治・経済の虚実』（日経BP社、2007年）135頁。

成中文的问题。可他在1992年9月，接受HNK采访时，面对记者“是否误译”的提问，却一边坚决否认“误译”说，同时仍一味强调原文措辞的初衷。说白了，两者完全想两岔了。

对此，矢吹晋指出：“桥本但凡把在原文推敲上所费功夫的一成用于推敲中文译文的话，兴许就避免了历史的误解。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说是这位不通汉语的中国课长的界限之所在。”因为，从田中内阁决定推动邦交正常化之初，为确保万无一失，尤其要维系与美国及日国会的挺台湾势力（青岚会等）的平衡，确立了排除外务省“中国帮”（China School）的应对方针，具体实务直接由“美国派”外交官僚栗山尚一（历任外务省条约局长、北美局长、外务次官和驻美大使）和中国课长桥本恕主导。连桥本的顶头上司、亚洲局长吉田健三都被桥本排除在政策决定程序之外，可谓“下克上”。

矢吹晋对桥本恕的盲目自信深恶痛绝，以为正是这种“官僚的自我保身与浅薄自负”，“招致日中间相互不信的悲剧”^{注13}。令矢吹教授愤怒不已，甚至不惜以如此“酷评”来指控者，还不仅仅是翻译问题上的刚愎自用。

两种版本的田中道歉

在9月26日下午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上，对田中的“问题”道歉，服部龙二在《日中国交》一书中以“怒发冲冠”^{注14}来形容周恩来的光火。而对周总理的愠怒，田中到底当场做没做过解释，为自己辩护呢？从田中其人的性格、身份及彼时所处的立场来说，不可能不辩护（当时在场的桥本也证明了这一点^{注15}）。而且，田中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述过当时的谈话，从北京回国后的当天，在自民党总部的报告会上及其后在首相官邸对记者的谈话中，也曾多次回忆过当时的情景。但服部查阅外务省的中日首脑会谈记录，未能找到相关记述。^{注16}对此，服部却一笔带过，并未当成一个问题。

矢吹晋注意到，1988年9月，由外务省解密、可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阅、复印，后由岩波书店于2003年公开结集出版的《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交涉》^{注17}一书中，涉及相关会谈内容的地方，只有一句话：“周总理的话，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注18}读此记录稿，给人一种感觉是“田中对周恩来的批评全然不介意，等于置若罔闻”，令矢吹觉得相当“怪异”，^{注19}疑窦丛生：“假定这份

^{注13} 矢吹進『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279頁。

^{注14} 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48頁。

^{注15} 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53頁。

^{注16} 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51頁。

^{注17} 石井明、朱建栄、添谷芳秀、林曉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年）。

^{注18} 原文为“大筋において周総理の話はよく理解できる”。

^{注19} 矢吹進『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85頁。

外务省记录稿的内容正确的话，那田中便是‘一张嘴，两片舌’——当场对周恩来没说过的话，回国后却沾沾自喜地四处说明。^{注20}”这不仅涉及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政治家人格的问题。

事实上，当时在场的中方官员张香山（外交部顾问）、吴学文（新华社驻东京特派记者）等人，后来均以回忆录的形式披露了当时双方的话语应酬。如吴学文在《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一书中如此写道：

田中首相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这个表达如果在汉语上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注21}

而大致同样内容的更早的版本，出现在中国副外长姬鹏飞的回忆录《吃水不忘掘井人》中。上文中提到的HNK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电视纪录片《周恩来的决断》的文字版^{注22}于翌年在日本付梓，1994年中国出版了中文版^{注23}，这份回忆录系作为中文版的附录而出版（日文版中则未附），署名为“姬鹏飞谈，李海文整理”。李海文女士曾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副主编，退休后为《百年潮》杂志副主编。

循着这个线索，矢吹晋与另一位汉学家、中共党史专家、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一道，两度赴北京调查、采访，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研究员的协助下，终于从中方的外交档案中查到了外务省外交文档中“缺失”的部分。在9月26日下午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上，面对周总理的批评、质疑，田中本能地意识到有可能是文本的翻译出现了问题：

田中：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

周恩来：可能是译文不好，这句话译成英文就是make trouble。

田中：“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了——这样表达，从汉语来看是否合适，我没有把握，语言起源于中国。

就是说，田中不但当场做了该做的回应、解释，而且把日文中“迷惑”的那种亦可用于“百感交集”时“诚心诚意”的道歉的微妙语境传达给了中方，并得到了周总理的“谅解”。

至此，矢吹晋认为自己彻底解开了田中道歉问题的谜团。在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前，有两个版本的道歉暧昧并存：一个是田中的“迷惑”，即“诚心诚意的道歉”；另一个是桥本的“迷惑”——所谓“添麻烦”。但由于在NHK20周年特别节目中桥

^{注20} 矢吹進『日中の風穴——未来に向かう日中関係』（勉誠出版社、2004年）16頁。

^{注21}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4月版，90页。

^{注22} NHK取材班『周恩來の決断』（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3年）。

^{注23} 《周恩来的决断》，NHK采访组著，肖红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本其人的“言之凿凿”和田中解释奇异“蒸发”后的首脑会谈记录文本（外务省外交文档）的流布，使得田中道歉“消失”，而“桥本流的迷惑”版本，则“升格”为日本政府的“公式见解”。客观上，全力推动并亲自主导了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两位政治家——大平正芳于1979年猝逝，田中角荣则因洛克希德事件被捕系狱（1976年7月），1985年罹患脑梗塞，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逝于1993年12月），已无申辩的可能。而桥本恕作为邦交谈判的亲历者、外务省实力派“影武士”，为保全自身的清誉，不惜改写历史的“脚本”，也并非不可能。

事实上，矢吹晋的指控，正是针对这一点：恣意“篡改”、“毁弃”外务省外交文档的始作俑者非桥本莫属：“桥本氏出于某种考量，删除了这部分内容”。矢吹甚至明确给出了“篡改”的时间：“大约是1988年9月，作为外务省的公务资料，相关文件加以整理并交付印制的时期。桥本作为中国大使赴任北京是1989年至1992年。赴任前一年，我曾关注过这批公务资料的整理事宜。”为此，2010年3月10日，矢吹晋致函时任民主党菅直人内阁外务大臣的冈田克也，郑重提出两点诉求：一是复原被认为是田中发言的“周总理的话，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一句中被省略的部分——所谓“大概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二是对田中“迷惑”发言的相关资料做彻底调查——

“惟田中访华之真相变得明朗，今后日中和平的基础才有可能加强。”^{注24}

四个月后的7月5日，冈田克也外务大臣复函矢吹晋教授：

根据贵书简的要求，关于当时的记录，由外务省方面对所保管的相关文件进行了重新调查。其结果，目前，除外务省公开发表的记录之外，未能发现记录该首脑会谈中双方对话的新资料。因调查需要时间，故回复有所拖延，还望先生海涵。^{注25}

矢吹晋之所以强烈质疑、抨击桥本恕“篡改”邦交正常化谈判记录的行为，是认为这件事做下了中方对日不信任的根子，使日方日后在反制中方的“反日宣传”时进退失据。其恶劣影响及扩大效应所带来的后遗症，甚至在邦交正常化40周年后的今天仍在持续发作。笔者虽然无法完全认同矢吹教授对首脑会谈记录“篡改”事件之影响中日关系程度的判断，但希望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邦交正常化谈判阶段，包括田中“道歉”问题真相在内的相关历史文档能尽快解禁。惟日方在此问题上有种种不为人知的幕后操作之嫌疑，中方解密文档的价值才更值得期待。此举无疑将极大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之相互理解，固化中日关系之基础，以期中日友好之共同利益的恒久维系。Q

^{注24} 矢吹進『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282頁。

^{注25} 矢吹進『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283頁。

城市中国的逻辑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xiayouzhi1997@gmail.com）

谈论中国的城市，有几个相互关联但本质上并不相同的问题。人口、资金和物资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留下一个人口结构两极化、经济上衰败而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农村，这个过程并不是最近30年才开始的。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研究中，人类学家费孝通已经细致地报告过类似过程。在他看来，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的后果之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是这个市场体系的特征。

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变革，也改变了社会组织 and 政治观念。对这个过程的反应是多样的。史学界有个著名的“器物—制度—文化”三段论，可以看作是晚期帝国改良主义者的路线图和心路历程，其目的是要让旧制度能够和新现实相匹配，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尤其

是1894年之后，甲午战争、戊戌流血和义和团之乱接踵而至，国内局势日益沸腾，革命党人终于提出了一揽子的整体解决方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革命方案有不同面貌。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从“社会主义改造”到“三面红旗”，其修正版本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个现代化”，乃至陈映芳教授在《城市中国的逻辑》中提到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第五个现代化”，则属于某个整体解决方案的延展和更新。这些方案从政制到土地制度，从工业化到语言文字，从物质到观念，无所不包，而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始终居于这些方案的核心，其整全性不但投合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偏好，在很多外国人看来，也很符合他们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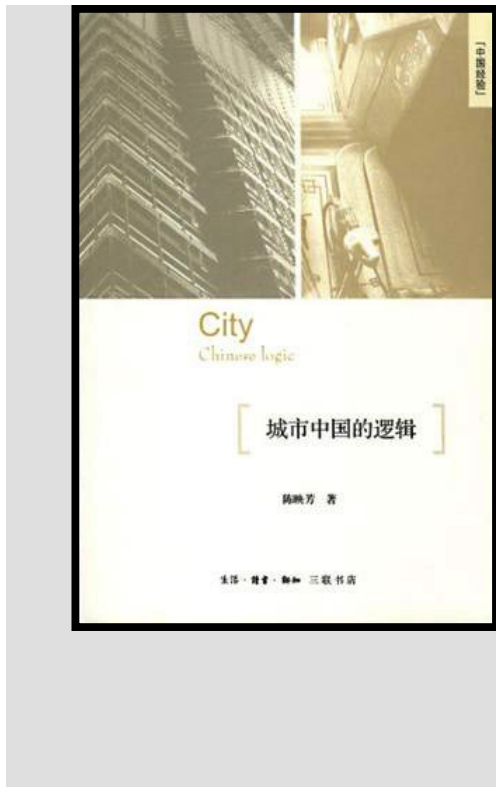
1940年代，大量美国外交官和媒体记者来到中国，战争让他们能够广泛地接触到中国的现实，特别是像费正清和

《时代》周刊特派记者白修德这样的年轻人，一方面被中国乡村的苦难所震惊，一方面亲眼看到战时和战后政府的腐败，城市和乡村就演化成了一对矛盾。史迪威担任驻华外交官多年，最后形成了一种信念，底层中国人都是好的，而官员都是坏蛋。毫无疑问，前者主要生活中在农村，而后者代表了城市。在二战中，史迪威脑子里的这幅景象渐渐在其他美国人头脑里也扎下了根。记者们笔下典型的中国城市只是由腐化金融资本家、军人和高级官僚控制的消费场所，而破产的乡村中无力反抗的农民承担着战争的全部负担，并且被绝望情绪所笼罩，两者之间是人数庞大的城市贫民群体：他们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和黑社会的双重剥夺。这幅景象后来演变成一个明确的信念：不管谁会得到权力，国民党都将被取代，因为他们已经无力抵达自己制定的革命目标。

不管是革命塑造的格局里，还是革命提供的解释框架中，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始终是20世纪的焦点所在。国民党希望通过掌握城市来控制乡村，而共产党在乡村中发现了通往城市和权力的道路。抗日战争期间，当城市一个接一个地沦于日本人之手，建立在城市之上的权力也易手了，但广袤的乡村是无法占领的。那里是战争的后方。杨奎松这样的历史学者反复提醒，到1945年，国共之间实力差距——实际控制区域的大小、军队的数量、动员的能力——较战前已经大大缩小了。所以，把“农村包围城市”这

个事实描述成历史规律，只是为新政权赋予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对费孝通这样的人类学家来说，乡村既为城市工业提供原料、劳动力和资金，又充当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导致其资源渐渐枯竭——这个进程是无法扭转的。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乡村建设，像他的姐姐费达生那样引入资金和技术，勉力维系江村的丝业，当然有其道德价值，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或减轻乡村陷入衰竭的痛苦。而且他深知，这幅城乡关系的图景，也是对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处境的真实写照。抗战期间在云南的人类学调查中，费孝通观察到战时经济特有的现象：由于国际贸易中断，已经全球化了的中国市场再次缩减为无数个分割的区域市场，乡村工业一定程度上



恢复了竞争力。他极力向政府建言，战后应通过谈判设立某种形式的国际贸易壁垒，为民族工业的发展争取时间。

但最后胜出的却是一个现成的方案。北京照抄了莫斯科的政策：政府不但控制城市，也控制乡村，不但控制生产，也控制消费，不但控制原料和资金，也控制人口。从1950年代起，这一方案经过几次修正，一直沿用至今。社会学家称之为城乡二元体制，并且深深意识到其中包含的不平等，以至于将消除其负面影响视作国家在保障种基本人权方面应尽的义务。

讨论城乡二元体制，就不得不提到，因为这个制度的修正而释放出来的迁徙自由，30年中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世界上最近一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轮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浪潮。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因此进入城市里工作、生活，在城市里纳税，虽然他们几乎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

这个修正过的体制被陈映芳称之为“有用的旧门槛”。说“有用”，是因为它仍然可以把大多数人挡在城市门外；说“旧”，是因为各地政府都在不断制定更精致化、更有效的技巧性政策，在吸纳一部分人进入城市的同时，排斥其他人。在上海等大城市实施的居住证就是个例子。

这类制度的本质，其实是把国际移民的标准和手段用于国内。陈映芳嘲笑说，中国农民要移民到城市，比移民到国外还要难。近年来，几十万名来自中国

浙江和福建等省份的农村移民（有些是非法的），陆续在欧洲国家获得了合法身份，而类似情况从来没有在中国的城市里发生过。

城市资源仍然被看作是部分人享有的特权。考虑到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法律规定的不平等之上（中国政府禁止农民将集体所有的土地用于城市开发。通过汲取卖地收入，政府占有很大一部分城市化的收益），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野蛮。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几乎同样多。大多数非户籍人口都是进城的农民。非户籍居民向城市政府交税，缴纳社会保险，弥补了日益沉重的城市户籍人口养老金缺口，但他们的子女无法享受城市教育资源，无法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养老账户则在他们离开城市的时候被注销。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自称，这样做有法律和道义上的依据。陈映芳严厉抨击这种厚脸皮的辩护，直言其已经突破了现代国家的道义底线，并指出，中国未来必须建立一套以普遍的、所有人一体适用的公民权为前提的迁移制度。

作为一本实证性的著作，《城市中国的逻辑》的立意并非要提供一幅新的改革路线图。对城市居民与移民对空间和其他资源的争夺，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并形成了理论和方法上的传统。陈映芳对上海的研究也是在这个世界性的学术传统中展开的。她在上海贫民窟和城郊地带进行的社会调查和口述史研究，不但描述了

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的成长史，也指出了这个城市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急剧增长的封闭性和排外情绪如何限制了它的活力和发展。这些研究还涉及城市空间如何在不同阶层之间分配：掌握着规划和开发权力的政府官员，掌握着资金的开放商，高档商品房的买主、老城区的底层居民以及外来租客，他们的行为和互动如何改变当代城市的外观和功能。阶层之间的博弈并没有依照公开透明的规则进行，而是充满了中国特色。围绕着“拆迁”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最终揭示了真正支配着当代中国城市的逻辑所在：

中国的旧城改造主要也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展开的。旧城改造、城市更新之类，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主导的。为了提高地价，政府通过规划将市中心许多住宅区圈定为危房，然后在行政力量的驱动、配合下，由开发公司、动迁公司出面迁走原住居民，铲除旧住宅区，再配之以绿地、轨道交通、以及各类高档公共设施等，虚位以待，共同打造中高档住宅区。这种开发方式本质上是对中心城区原住市民的土地使用权的剥夺，也是对居民房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侵害，更是对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化的空间排斥。^①

在这种看上去是最近20年才出现的现象中，有历史感的研究者很快发现了这

种思路与整全性革命方案的思维方式的相通之处：

你可以看到各种政策设计——特别是户籍制度——正是为了制造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一个庞大的人群，本来可能以租房方式安排自己的居住生活，但一旦城市政府把医疗和教育资源、养老政策等与“房产权”挂钩，他们就不得不加入购房大军。这个庞大人群的存在，保证了政府始终可以从地价中获得高额收益。这种精巧的制度设计显然有着明确的目标和策略的。

陈映芳的结论是，“中国城市的住房自有率在世界上高到不可思议，是一种耻辱，而不是骄傲。”我们则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种耻辱是历史性的，有其久远的思想和制度渊源，绝不是什么突然爆发的能够令人寡廉鲜耻的市场病毒。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尽管“文革”因为蔑视法律、产权和个人尊严而受到抵制和谴责，但为了避免争论，人们在“向前看”的号召下，最终选择了一条看上去更实用的道路。国家赋予了农民30年土地承包权，但禁止交易耕地，也禁止未经政府许可和参与而在耕地上进行商业开发。直到30年合同即将期满时，政府才匆忙宣布延展土地承包合同。这一事实最能够说明，在基本制度领域，实用主义是何等捉襟见肘，而在一个利益分化

^① 本文中所引陈映芳教授的观点，来自此书出版后笔者与陈教授所做访问和邮件讨论。

的时代，政策又是如何被握有解释权的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而刻意歪曲的。

陈映芳追踪了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并且讨论了中国权力系统的城市化。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国家党政系统获得了更新其支配力的特殊机遇和技术条件，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推动城市扩张的主体。她正确地指出，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国家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是无法区分的。国家（包括国营垄断企业在内）及其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主体，同时也是资本的主体。在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并推动的“产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过程中，主政集团掌握着全部国有资源、公共事业资源，也垄断着重要的经济产业和公共事业的经营权。在此前提下，它创设了一套政治经济体制，不但可以确保自身集团的主政地位和开发利益，也能确保国家整体经济增长，同时还创设了一套以“社会建设”为名，实际上遏制社会发展的社会体制。

其结果就是我们如今不得不每天面对的现实，“体制为权力系统带来了可支付财富，用以换取庞大官僚集团、体制内知识精英的臣服和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区隔市民与外来流动人口，市民有限地分享了城市开发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忍受了城市开发过程中的不公”。

在谈到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问题时，不应该假设城市化和现代化是所有人共同认可的前提，从而忘记了中国也有反现代主义者存在的事实。

反现代主义者质疑现代化的前景。

他们要么认为城市和工业消耗资源过多，必将超出地球的承受限度；要么认定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自由市场体系带来收入两极分化，最后将把城市推入暴力的深渊——大多数情况下，两种怀疑兼而有之。他们提出抵制跨国企业的全球影响力，要把农民留在农村，并强化政府在再分配中的权力。

快速增长的房地产业使土地和资金急速流入城市，也扩大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是反现代主义者近年来批评的主要对象。与通常被称作“新左派”的具有激进和国家主义特点的学者相比，陈映芳对城市开发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批评，是从一个完全相反的角度切入的：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扭曲了市场的机制，与城乡二元体制一起，损害了农民和底层城市居民的经济利益，也压抑了他们的政治权利。

在10年来的研究中，她始终支持现代化的基本价值——也即自由市场和人权政治，并批评那些以反西方为名反对现代化的人，批评他们无视中国人100多年来为现代化付出的努力和牺牲。

我将这种罕见的姿态描述为“左右开弓”：一方面质疑那些以“现代化”为名进行的开发中包含的“形式上的不合理性和实质的非正义性”，另一方面质疑“各种在反现代、反西方、反普世价值或后现代等名义下出现的特殊主义、反面乌托邦等等的思潮和理论”。在现实中，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等同于现代病、等同于美国”，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

思想短路状态随处可见。批评者一方面连“普世价值”这类极其普通的用于描述现代世界格局的术语也不予承认，而是作为一种敌对的政治计划大加鞭挞，另一方面，将费孝通在1940年代描述过的乡土中国（费孝通在大多数时候用的是过去时）浪漫化，视为反“普世价值”、反西方、反美国的武器，过分强调中国发展的特殊性。

反现代主义者对现代化的质疑，自然有其价值。左翼有其独特的“普世”传统，一直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地质疑现代化带来的消费主义、环境危机和金融资本与政府之间的利益输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对各国政府和跨国治理机构保

持压力，完全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但在中国，很多反对现代化的人士，常常滑入国家主义的窠臼。他们将反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当作某种施政纲领，因此迫切地要求扩大国家的权力，然后再试图去影响权力的运作，而不是与社会运动联手，去扩大个人自由和自治。这种思路 and 做法都不免令人生疑。考虑到100多年来，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历史及其付出的惨重代价——包括数亿曾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和几乎所有人至今不完整的公民权利，陈映芳认为，中国式的反现代主义者，其态度本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我认为，这是《城市中国的逻辑》中最振聋发聩的声音。❶

他人的心事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 (广州, peessoa1935@gmail.com)

省港相邻，罗孚的名字是不陌生的。虽然，距离左派辉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远，但这十年来，我在广州曾经多次遇到署名“丝韦”的港版书。他就是罗孚，是周作人与曹聚仁、鲍耀明书信中提及的香港新晚报编辑，是八十年代在《读书》杂志上第一位推荐董桥的人（《你一定要看董桥》），也是《聂绀弩诗全编》编者，但这些都是做配角的掌故，侧身在他人的阴影里。罗孚作为主角的故事，是因滞留北京十年（1982-1993）而传闻甚广的那个人。

近三十年来，罗孚的“美国间谍案”是文化圈谈论较多的一桩公案。去年，香港出版了由其子罗海雷所写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香港天地图书2011年7月），立意也是要披露“北京十年”的缘故。此外，更有不少人写文章，发凡钩沉，终归隐隐约约，甚至有的文章只能归结到一再问罗孚

而罗孚并不声辩云云。对这件事所知不多的读者依然所知不多，并不知道准确的理由，内里的是非曲直——何为冤案，冤在何处，读完与未读一样雾里看花。

今夏接到北京朋友谭然兄寄来几纸复印件，系许礼平先生在《苹果日报》所写的三篇长文，其中一篇即是关于罗孚者，题目正好是《雾里看花说罗孚》。许先生因为与文化老人黄苗子以及罗孚本人都有交往，文中不乏秘辛，比如，当年罗孚是如何从广州被弄到北京，消息传开后北京文化圈又有何种反应，等等。这篇文章最有意思的，乃是许礼平让黄苗子出具一纸证明，当年听到罗孚被抓时一些文化人的言论，时在2010年11月，经过修改的黄苗子证明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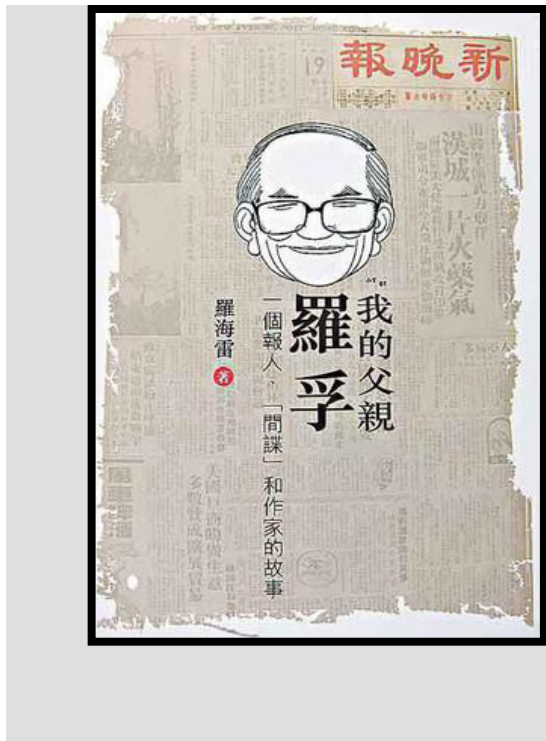
“记得一九八二年罗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询之廖承志同志，答谓在调查中。隔数周后，再和廖公谈及此事，他说：可能是误会，现正在设法中。记得夏衍同

志亦知此事。”云云，黄苗子的手迹并刊于该文旁边。当事人罗孚还健在，但坚不吐一词，有谓其对家里人亦然。正因为如此，大部分外围文章总是在外围打圈，无法进入到事件核心，更无法进入到当事人的内心。

许礼平文中提到了罗孚的《北京十年》这本书。这是罗孚写他在北京期间所见所闻所忆的书，以连载的形式在香港联合报刊出。港版结集为两集，大陆版都为一册，于2011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套罗孚文集还包括：《香港人和事》《南斗文星高》《香港，香港……》《文苑缤纷》《西窗小品》《燕山诗话》，一共七册。

正是因为许礼平这篇文章，使我找到《北京十年》读，正因为读《北京十年》，发现从前的疑窦似乎豁然开朗，对于历史迷雾中的人和事，像盲人摸象那样，大致拼凑，心里有了个图像。如果说另外六部作品反映的是作为作家、文人的罗孚，那么《北京十年》要表达的是罗孚自己，是属于他的故事。因此，这本书实在要比其他六本更具有阅读和分析的文本价值。

《北京十年》共四辑。第一辑“我和我的朋友们”，记的是罗孚在京期间与首都文化界人士的交往。除了那些鼎鼎有名的，也有一些冷僻的名字，比如《与齐白石为邻》，《电子一条街》，《我的邻居们》则记着与张谷若（哈代专家）、侯德健住同院，和歌手程琳、毛



阿敏同一个单元楼，另外还写了一些外地来京打工的姑娘们。从这些居住细节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位化名“史临安”的老头子的生活：他住在哪里，自由限度，还有可能与我们的生活重叠的历史痕迹。

但是意味深长的“在京期间”，正如前面提到的黄苗子“证明”所言，毕竟是一件大事，远不止个人生活这么简单。于是罗孚写了聂绀弩、丁聪、杨宪益、黄苗子、钟敬文、启功、范用、郑超麟、楼适夷、吴祖光、黄永玉、冯友兰、舒芜、舒展、萧乾、夏衍、李一氓、钱钟书、周而复、陈迩冬、章士钊、端木蕻良、张洁、王世襄、常任侠、卞之琳、臧克家、李锐、王力（及其儿子秦似）、朱光潜、沈从文、荒芜等文化人。这些人之中，有的是罗孚与之交往的，有的是过去曾经有过交往的

（就是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写的是所见所闻还有回忆）。与文化人的交往，当然少不了“世说新语”，兹录数则：

有一个时候，据说北京有三个“什么都敢”的人：“吴祖光什么话都敢说，刘宾雁什么文章都敢写，范用什么书都敢出。”

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出来后，《文汇报》刊发读者来信，人物影射邓大人，据说是总编辑郑伯农写的。王蒙状告该报诽谤。

“小丁”丁聪给罗孚所画漫画像很出名，罗孚请黄苗子题诗于背面，准备两面欣赏，但丁聪认为“把我压下去了”，虽经解释亦不能释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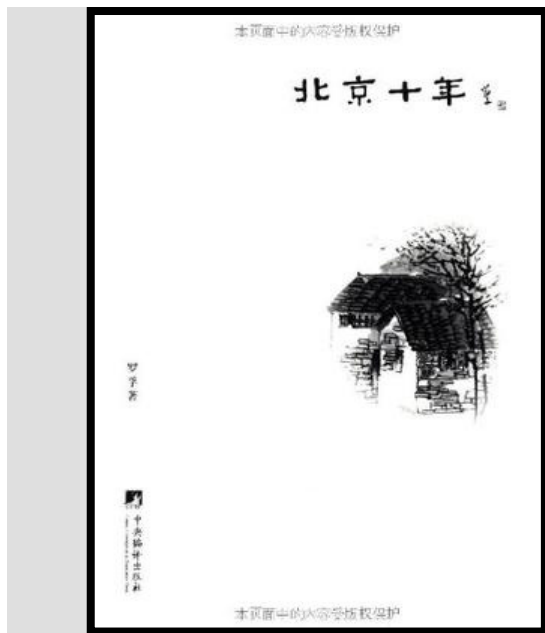
李可染被文化部来的四个人问有关卖画的事，吓得心脏病发作，去世。

某日罗孚在街上，遇黄永玉驾小车，车上都是熟人，正要去吃饭，庆祝。一问，原来那天上午选举中邓力群落选，选不上常委，失去了继续当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可能。

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他对于三石年代的一些往事，总是念念不忘，说了又说，一点不是‘懒寻’，实在是‘勤’得很。”

作家孟伟哉以极“左”而不安于中宣部文艺局之位，苦无出路，后求得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之职，与邵宇一时被称之为“左左相惜”。

大概是个人兴趣的缘故，罗孚笔下的启功、杨宪益、荒芜等人缩写的诗词，



《北京十年》
罗孚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5月

都有大量的引用，很明显他热爱旧体诗词，这似乎也更能说明为何他是聂绀弩诗集的编者。其中对荒芜诗词的引用最多，而其讽世之意，大胆程度，实不下于杨宪益、聂绀弩也。

引用这些细节，以及众多交往的故事，可以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圈的一些现实，颇有历史感。但更值得一叹的，是借这些交往的人，读者大致可以看到那个被迫滞留北京的“史临安”淡淡的影子。不论这是否是罗孚的写作初衷，都可以说不失高明之处，尤其是他一直以来坚不作正面回答，我们只能凭借他眼中的其他人，来映照出彼时软禁中的这个作者的面貌和经历。

《北京十年》更为丰富和耐人寻味的，是其后三辑。

“胡风集团人和事”、“我所知道的周作人”、“潘汉年和袁殊的传奇”所涉及到的，几乎个个都是经历丰富，遭遇奇特的时代人物。罗孚虽为媒体所作连载文章，但就文字的平实、材料的丰富、结论的客观公正而言，实有做学术的严肃和严谨。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相信，这是他的苦心经营之作。罗孚为胡风集团各色人物记录其遭遇，活像一部知识分子的受难“传记”，这些人之中不少人与他有交往，因此更觉得字里行间深沉有味。相比之下，罗孚与周作人，只有上世纪六十年代新晚报时期的编者作者之间的交往，甚至和周与曹聚仁、鲍耀明的交往对比，是较为疏离的（罗孚提到，有限的交往也有当时的阶级思想作怪）。而他对共产党的优秀情报人员潘汉年、对多面间谍袁殊这两个人的非凡经历的梳爬，对他们人生命运中的风光与逆境，所花力气甚多，更何况这两个人至今也算得上不必谈的禁区人物。

上世纪五十年代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胡风集团人物，其精神创伤一直延续至今，而大节有亏的周作人，更因为“文归文，人归人”的两难，至今没有调和。好卧底潘汉年，多面间谍袁殊，表面来看是他们的人生具有极大的反差，而其实在那些出生入死的岁月里，又何妨没有瞬间的万念？想必在这些他人的经历中，书写者亦能想到抗战中的编辑生涯，香港左派报纸的人生经历，以及突

如其来的噩运。罗孚为什么选择为这些人“立传”，钩沉他们的来龙去脉，何尝没有一点借此浇自己块垒的心声呢？这些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极大的冤屈，但他们都保留了自己的某种底线，尤其是潘汉年与袁殊，为了某种职业准则或者纪律，而绝不辩解。他们的心事掩藏至深，任凭世间人众说纷纭，只有通过曲曲折折的反射，方能让人看到一点：歪斜的影子。

罗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专题研究？罗孚为什么要写胡风、周作人、潘汉年和袁殊这样的人？也许这只是他的个人爱好，但足以作为理解他对间谍案缄口不言的钥匙。他无论是迫不得已还是别有怀抱，都只能显得这是一桩悲剧。但明显的，保持沉默远比大声疾呼式的控诉更有尊严，更有耐力——这是另外一种坚持，并且更值得尊敬。

我曾经特别留意鲍耀明日记中提到的周作人与罗孚之间的往来，何以当年发文章、出书一再反复，终于被搁置，现在终于从亲历者笔下得知了一些真相。唐瑜为纪念潘汉年所编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多年前已经看过，李一氓的《存在集》题记“献给潘汉年同志”，并有一篇《纪念潘汉年同志》，似乎都没有罗孚这一组文章令人低徊感慨，这是因为其中寄托了太多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故事，甚至连讲述者的身份都还是一个禁忌，一个名义上的“失德者”。对于人世的不公，命运的捉弄，个人的隐忍，曲折心迹，读者触手可及。🔴

行脚印度

——无处不为家

特约撰稿人 维地亚(印度, vidyaaware@yahoo.com)

印度曾是,也一直会是全世界特别具有灵性倾向的国家。表面上,印度似乎混乱无序,而且从现代人的观点,它显得不合逻辑……

——宗萨钦哲仁波切《朝圣》

由于受它的灵性倾向吸引,几年来,我不断地来到这个国家,在它的混乱无序和不合逻辑中游走,企图修持佛教“无二”、“无分别”的平等心。虽然,几年下来,我远远没有做到“无二”,分别心也

还大大的有,但有一点好歹有所改变,那就是:不再情绪激动,以平静的心态就事论事地去面对人和事,而且,还多少发了一些幽默感。是的,幽默感,它在印度是必不可少的。



菩提迦耶乡村的印度人

此番，带着两个孩子，我又来到了印度，目的地分别为佛陀成道的菩提迦耶和师父宗萨钦哲仁波切的驻锡地Himachal Pradesh邦的喜马拉雅山南麓某小镇。

从德里去菩提迦耶的时候，朋友帮买的车票，只买到了慢车的，快车一夜的行程，变成了我们的一天一夜。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让两个女儿 Jai Satya 和 Lila 不能忍受的是，简陋的卧铺车铺位周围一应全是不会英语只说印度话的大男人：除了他们对来自不知道哪里的人们母女仨表面假装绅士私下偷偷觊觎的目光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肆无忌惮的呼噜。一夜之后，筋疲力尽地从铺位上坐起来，互道早安时，我问孩子们睡得好不好。当然不。都是因为好吓人的呼噜。当我说自己也是，十岁的Lila揉着红眼睛对我喊道：“妈妈，你运气好，你下铺对面那个人的鼾声，只是震动了我们的车厢，而我上铺对面这个人呢，他震动了整列火车！”Lila的幽默感让我和Jai Satya爆发出比印度人的呼噜还肆无忌惮的大笑，而且是一遍又一遍、想起来又止不住了的大笑，每每让醒来后安安静静坐在铺位上养神的印度人干瞪眼，如此，算是和印度人拉了个平局。

在菩提迦耶火车售票处买回程票的时候，行脚路上一般来说节俭到吝啬的我，就下定决心要买最好最贵的铺位。我知道A字开头的车厢只有上下铺而不是

像我们来时坐的B车厢有上中下三个铺位，就是说，坐在A车厢，邻居减少了，鼾声也会小一些。我在单子上无懈可击地填好了包括我家乡地址在内的各种复杂而无用的数据，提供了护照复印件，售票员英语很好，完全明白我要买哪种车票，态度也很耐心和蔼，结果，我如愿买到了和一起走的台湾朋友同一车号的票，却未能如愿地和她们分享她们的“豪华”车厢，虽然，上车后证实那个车厢的绝大部分铺位是空着的，虽然，买票时我口头特别强调了已买好了票的朋友的车厢号。

原来，是友好的售票员替我作了主，一厢情愿地把我们安排到了二等车厢。

“你要的车厢的票挺贵，我会尽量把你们几个人安排到一起的。”买票时隔着售票窗口的小洞，乍听他这么说，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因他很合作的态度而感动地使劲点头。待付钱的时候，我才有些狐疑了，因票价比台湾朋友说的少了一千卢比，但售票员身边的打印机已经抢先把票打印出来了，我已无有选择。拿到票一看，B4车厢，完了，和来的时候一样的等级，那也噬脐莫及了，售票窗洞前早已无秩序地趴满了一大堆背影灰扑扑的印度男人。

火车按时开出，我们一行七个人分两群登上不同的两节车厢，中间隔着至少五节车厢。台湾朋友带着和Lila同龄的两个女儿，本来，大家相约一起走，是为了让孩子们一起坐车玩的，无奈隔得老远，上车时天又已完，安全起见，我制止了Lila

穿越五个车厢去找小朋友的计划。

恰逢是印度人过Diwali年（排灯节）的日子，想来大部分印度教徒已到家，坐火车的人颇少，除了我们和另一位一起走的师兄日本人Atuski外，我们的铺位周围没其他人，免却了被呼噜侵扰的问题，幸哉！

更幸运的是，在车上吃到了一顿出奇地好吃的印度餐，居然还有冰淇淋作为饭后甜点，居然是免费的，不，准确地说，饭钱是包含在车票里的。坐过中国的软卧，西欧的头等车厢，吃饭都是要自己花钱买的，且都不咋好吃，下意识里也接受火车上的东西就是不好吃的事实，不曾想这印度火车的饭菜却相当出色，给了我们一个相当的惊喜。像飞机套餐一样包装的托盘端上来后，发现除了米饭、煎饼、豆汤、蔬菜等正餐外，还有酸奶，有pickles（一种印度酸菜，相当于中国菜里调味菜的豆腐乳之类），勺子也是不锈钢的而非塑料制品。十八岁的Jai Satya在印度上了三年高中（刚毕业），很懂得吃印度饭，这下我有机会向她学习了，像印度人一样用手以正确的方法把汤、饭、饼、酸奶和Pickles和在一起搭配着吃，哎，真是美味，比我之前用刀叉吃过的高级酒店里昂贵的印度饭都好吃。

服务生相当周到，周到到过于，不断跑来问你还需要什么，原来，收了盘子后，是要小费的。我们给了三十块，他嫌



不够，指着手里的一百元，纠缠着不愿意离开，再给十元，才打发掉他。

凌晨三点半，将到达终点站 Pantankot。Atuski在印度旅行颇有经验，Jai Satya在印度三年，坐火车也颇在行。睡前他俩把手机、Ipod的闹钟一共五个全都上了发条，以确保我们不会睡过头。他们知道，没有人会来叫醒我们，火车上根本就没有列车员。

下车的时候，果然没人理我们。火车在 Pantankot只停两分钟，我们沉重的行李山一样高堵在车门前，Atsuki一如我们，都是在路上生活的人，行李总是带到最大极限。此番，下车后，我才如梦初醒，出了一身冷汗。天，如果不是因为Jai Satya在印度生活过三年，这次我们可能完全没办法下车，即使下了车，恐怕也没办法及时把行李都卸下火车。

也许，我把Jai Satya送到印度上学，就是为了在三年后这两分钟下火车作准备的。总之，我们没有落到悲惨的地步，是因为有她。

车还没有停稳的时候，只见运动型、身手矫捷的Jai Satya动作熟练地把绿色车门的上下两个旋转插销拉开了，车一停稳，她即打开车门跳下车去，命令我们快速把行李一个个扔下车，同时，她也瞭望五个车厢远之处的台湾妈妈是不是下车了，发现不见她们人影的时候，她飞跑过去，果然台湾妈妈正站在她们的豪华车厢门背后，指手画脚表示不知道如何

打开车门，Jai Satya飞速再跑20米从打开的另一节车厢门上车，及时为台湾妈妈开了门。当她们下车的时候，列车开始重新启动。

一行人总算顺利地、胜利地团聚在漆黑的月台上，佛教徒的我们，不免习惯性地要这样想：阿弥陀佛，上师三宝加持，我们才没有在深更半夜被带到一个不着边际的印度车站。

故事还没完呢。

我们早通过一个旅行社安排好车来接。冷落的站台上，却不见来接我们的人，车站外也没人，倒是有几个人向我们兜售出租车。寒风中，我和Atsuki向他们打听到停车场的位置，去到停车场，根据车牌号，才找到了那辆来接我们的中型客车。

司机是个年轻的印度人，瘦削、灰灰的、不起眼，在印度特别多的那种，正在方向盘下面沉睡呢。被我们叫醒后，他瑟缩着肩膀被动地跟我们走到站台上，看见我们的大堆行李，明确干脆地拒绝了帮我们拿任何一件行李。

好在，行李虽多，但旅行有经验如我们者，带的行李的数量和重量，在短距离内，仍然可以一次性被我们自己挪动。

吃力地把行李搬出站，搬到了车前，司机再次拒绝帮我们把行李放到车顶的行李架上，用简单蹩脚的英语示意我们自己干。再者，他没有带绳子。再者，我们发现，他的行李架远没有我们订车的时

候旅行社给我们看的图片上的大，车子也显得窄小，我们一行七人加上那么多行李恐怕没办法坐这车走。

在印度遇到各种怪状况，都不用大惊小怪，何况大家都是修持不期待不恐惧的佛弟子。我们都不动声色，分头给旅行社老板打电话投诉，并向始终围观在一旁兜售出租车的印度人打听他们车的价格，这才发现旅行社的价格高得离谱。我们开始考虑坐一辆够大的本地出租车，本地出租车的主人即刻开始把我们的行李往他车顶上放。这时候，旅行社车子的司机才慌了，递过来他的电话，他的老板在电话那头低声下气地请求我们一

定要坐他们的车，他先是降了价，再是责成司机合作，这些都不能让我们心软，但他最后一个理由却让我们几乎回心转意了，即，这车是开了两个小时专门过来接我们的，我们不坐的话它就白跑了。我们并不同情那个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懒惰的司机，但我们都是环保主义者，我们确实不忍心让这辆车白跑四个小时让路上的树木白吞了它的废气，于是，我们犹豫了。

我们商议，可以把孩子抱在怀里凑合着坐，但，没有绳子，我们这么多行李要怎么固定在车顶上？黑灯瞎火的，而且是Diwali，白天也没人开商店，司机到



菩提迦耶街头为过排灯节运送神像的印度人

哪里去买绳子呢？

眼睁睁看着本地出租车的司机把我们的行李一件件搬上车顶并亮出结实的绳子来，懒惰的年轻司机尴尬地站在车旁，一筹莫展。

这时，不可“理”（谁的理？）喻的事情发生了：年老的本地出租车司机把绳子扔给了年轻司机，对我们说，还是让他载你们走吧，本来是他的生意。

习惯于不动声色、不做判断如我们的这些佛教徒，这时候都惊讶得互相交换起意见来。台湾妈妈说，这在台湾是不大可能的事情，Atuski也说，在日本也难得碰见这么无私的人，我的眼前立即浮现中国大陆通常好坑人的出租车司机穷凶极恶的嘴脸，对他俩也笑言这种事情恐怕只有在不合逻辑的印度才可能发生罢。

老司机把车开到和年轻司机的车并排的位置，把行李一件件扔给年轻司机，并帮他绑好。很快，我们得以成行。坐上车，我们都说，可惜，没有坐成老司机的车，这人真好，和他一起旅行一定更愉快。

故事还没完呢。到达了目的地，卸完

了行李，付钱的时候，年轻司机把他的电话给了我们中的一个，那头当然是他的老板，老板讲了一大通话，是想向我们要更多的钱，而且要的是最先讲好的价格，他的理由：“……”

这再次提醒我们，这是在印度，这样的事情没完没了，无有穷尽。我们不要听下去任何理由，我们简单地把电话挂掉，把最后讲好的钱数给了司机，对司机说，谢天谢地，也谢谢他，总算到了。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请他吃早餐，更多的钱，对不起，是没有的。

我们这些来自亚洲东部的佛教徒，连同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这样一回回地来到佛祖的故乡印度折腾着。我们的身体，更有我们的一颗心，被反复磨练，尽管在路上很辛苦，尽管有时举步维艰，但我们不抱怨，因为，印度所给予我们的，远比我们能在自己国家相对舒适的环境里得到的多得多，特别是，通过印度的历练，在无二和无分别方面，孩子们会比我学得快，做得好，我也希望，并相信，她们能在任何环境里，任何情况下，心安自在，游刃有余，无处不为家。Q

“一群人就成了一头畜生”



特约撰稿人 罗四翎 (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如果你的朋友们纷纷都从桥下跳下去,你会不会也跳下去呢?对此,美国女作家雪莉·杰克逊的回答是:“Yes!”她曾给出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这便是1948年6月26日发表在《纽约客》上的短篇小说《摸彩》(The Lottery)。

《摸彩》的故事很简单:6月27日,美国某个300人的村庄举行着一项古老的摸彩活动。没有人知道这项传统的由来,所有的仪式都变得有些敷衍,但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必须参加,甚至腿断了而不能出席的克莱德·邓巴也由其妻子代抽签。第一轮由户主代表全家去抽签,那张画着黑点的“彩票”被哈沁森太太的丈夫比尔抽到。于是下一轮抽签在哈沁森先生、哈沁森太太以及他们的小女儿小儿子一家四人之间进行。尽管哈沁森太太表示反对,甚至要求已经出嫁的大女儿也参加抽签已降低抽中概率,但并不能阻止厄运的降临:哈沁森太

太——这场仪式的唯一迟到者抽到了那张彩票。她在广场中央尖叫“不公平不公正”,可是此时,村子里的人开始纷纷对她扔石头,以便尽快结束这场仪式,可以赶回家吃午饭。

《摸彩》很短,一万来字,犹如一个恐怖的寓言。一个月后,杰克逊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对她的读者说:“要解释我想在这个故事中想表达什么非常困难。我猜想,我是希望通过讲述一个发生在现在、发生在我村子里的古老野蛮仪式,让我的读者感到震惊,震惊于他们自身生活中无意义的暴力和普遍的非人性所构建的戏剧般的事实。”

杰克逊所要表达的,几乎正是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所表达的:群体究竟通往何处?在勒庞看来,群体的从众心理会让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失效,“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

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经历过集中营集体疯狂年代、生活在冷战恐惧中的杰克逊，对群体更是不抱任何希望。“一个人可能是伟大的，但一群人就成了一头畜生，而且是一头自己会吃掉自己的畜生。”即便是人人有平等机会参与的民主形式，在杰克逊看来，依然可能是杀害个体的一种集体施暴方式，并成为一个个堂而皇之的幌子，一如《摸彩》中哈沁森太太之死。而最令人恐怖的是，民主也无法阻止人性的黑暗。哈沁森太太要求已出嫁的女儿参加抽签以降低中签概率、一位村民把石头放到哈沁森太太小儿子手里让他砸自己的母亲等可怕的细节，让杰克逊的母亲都为此与之翻脸。

颇为讽刺的是，读者的反应以及招致的群体怨恨似乎更让杰克逊震惊。小说发表的那个夏天，不断有读者因此取消订阅《纽约客》，给杂志和她寄去恶毒的信，不仅有右派，更有热爱民主的左派。那时，杰克逊每天差不多要收到八到十封信，还不包括每周《纽约客》给她寄

去的装满读者来信的包裹。1960年，在一次演讲中，杰克逊回忆说：“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多的人愿意坐下来给我写那些我甚至都不敢打开看的信。那个夏天，在我看过的三百封奇怪的读者来信中，其中只有十三封是友好的，他们几乎全部来自我的朋友。”

幸亏，杰克逊对自己的小说非常有信心：“即使我只写作和出版了这么一篇故事，人们也一定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名字。”她的丈夫，文学批评家斯坦利·海曼说：“她总是很骄傲南非联盟禁了《摸彩》，因为她觉得他们至少理解了这个故事。”而对于自己的作家妻子，他的评价是：“她犹如我们这个时代敏感而又自信的解剖家。”而今，时间已经证明，他们两人是对的。《摸彩》不仅被视为最经典的短篇小说之一，还被改编成电视、电影，搬上舞台，更进入美国中学大学教材。

我正是在我的课堂上读到这篇小说的，老师以此教导我们认识集体无意识行为以及置身其中的个体。彼时，传来地球另一头多个城市出现打砸抢的消息，一位无辜市民被砸穿颅骨。我才真正感觉到《摸彩》的恐怖，这个故事并不遥远。Q



PHOTOGRAPHY

大货司机

特约撰稿人 刘飞越 (北京, 115918256@qq.com)



2011年3月29日, 去往哈尔滨的高速路上, 夕阳斜照, 大货车影映在公路外。





42岁的黑龙江黑河人郭伟明，2009年从客运公司下岗后，通过亲戚担保贷款8万元买了辆大货车，开始跑河北泊头与哈尔滨之间1400公里的专线。从此以后，驾驶室内半米多宽的“床”，就成了夫妻俩流动的家。

2011年3月26日晚，河北沧州泊头货场，郭伟明独自在通铺上看电视等待装货。这一趟他们载的是一批化工桶。郭伟明与前妻有一子一女，儿子在大连上技校，女儿在哈尔滨读幼师。因为长年在外跑车，和孩子见面机会不多。





2011年4月11日晚，一辆大货车快速超过郭伟明的车，车上的篷布没绑牢被风吹开，十分危险。



2011年3月28日早晨7点，颠簸了一夜的郭伟明在服务区简单休息洗漱，准备吃些东西。在他身后，等待洗漱的司机同行排起了队。



2011年4月11日，郭伟明在驾车，老婆在给他做早饭，豆腐丝卷大葱黄酱。为了节省成本，两口子吃住都尽量在车上。



2011年3月29日，郭伟明夫妇俩半路卸货后重新捆好苫布。



2011年11月16日早晨7点多，郭伟明的精神几乎崩溃。前一天深夜，像往常一样，妻子为他指挥倒车，一瞬间，他用自家的车把自己的妻子撞死了。





2011年12月2日，天津，郭伟明在火葬场老婆的遗像和骨灰盒前焚香烧纸。身后站着的是妻子带过来的女儿。作为直系亲属，她可以从郭伟明处得到30多万元赔偿。这是连保险在内的全部积蓄，包括那辆还没卖出去的卡车。

从河北泊头到哈尔滨这一趟，运费是1.2万元。支出油费4450元、过路费3200元，尽管这次难得没交罚款，但修车和换二手轮胎多花了4600元，总计12250元的支出，让这一趟反而赔了250元。郭伟明的车上已贴上了卖车的广告。得知这辆两年前8万元买的二手车，现在最高只能给到6万元后，郭伟明很不满：“卖废铁也可以卖5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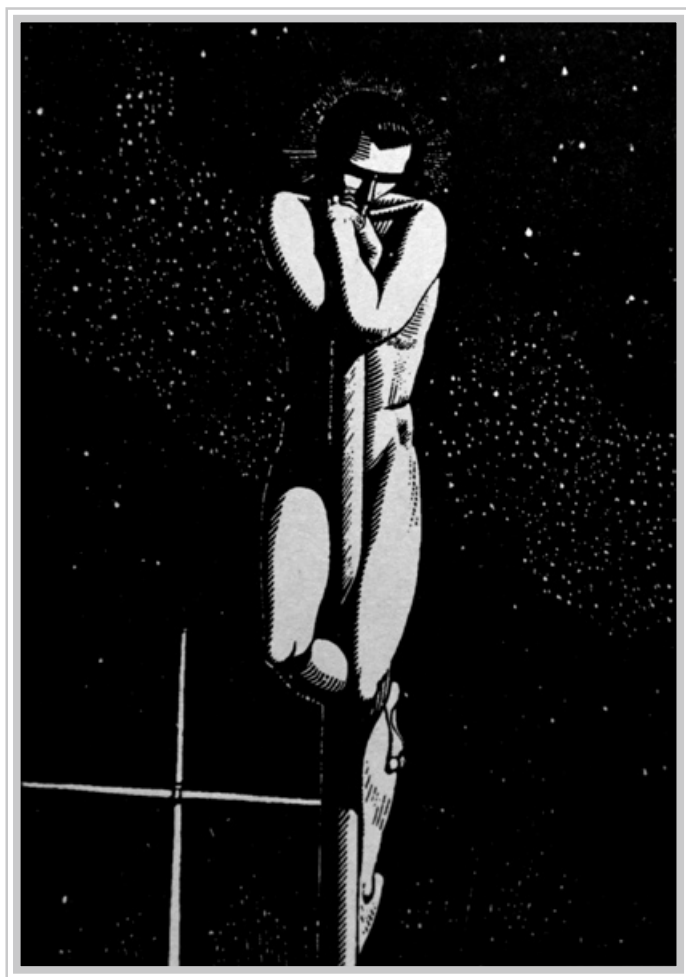




2011年11月19日，一无所有的郭伟明望着已经不属于他和他妻子的卡车——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2011年11月19日，天津一事故车停车场内，郭伟明在驾驶室兼卧室里整理完妻子的衣物，陷入沉思。Q



桅顶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